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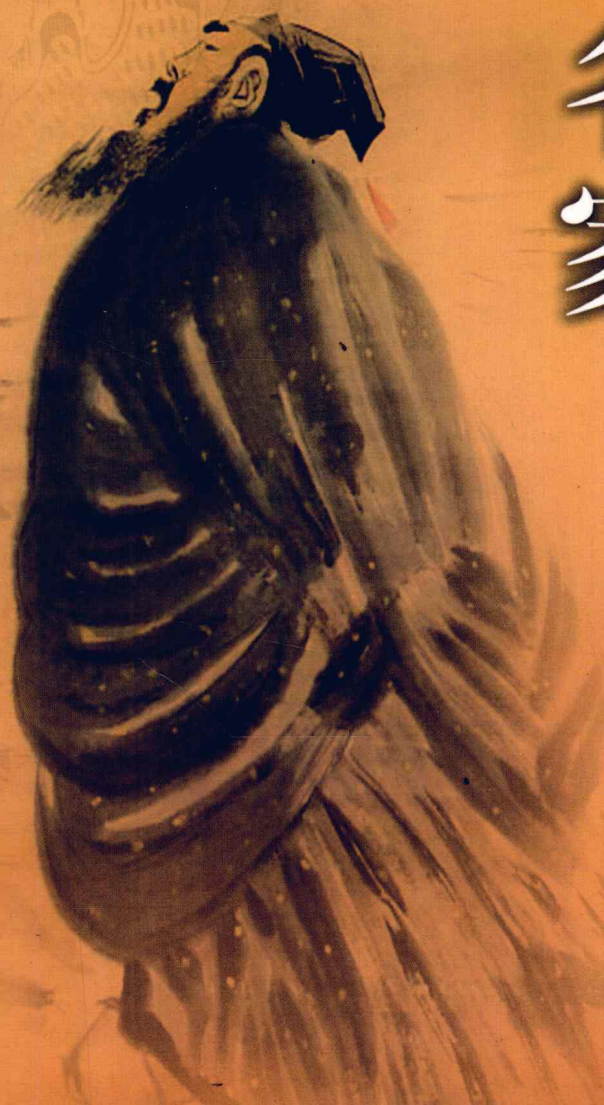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  
文化  
知识  
大观  
园

文学  
艺术  
卷

辽海出版社

# 文学名家

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



• 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·文学艺术卷 •

# 文学名家

## (下)

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

辽海出版社

了虞侯加以惩处，虞候极力诉说庭筠在里巷中的劣迹，于是令狐绹把二人都释放了。从此，他的恶劣品行便传遍了京师。庭筠亲自到长安，投书于朝廷命官，为自己洗刷冤屈。后来皇帝委任徐商作宰相，执掌朝政，徐商替他说了很多好话。没多久，徐相罢免相职到地方上任职，杨收为了谴责庭筠，把他贬为方城县尉，后改迁为隋县尉，直到去世。

他的儿子温宪，进士考试及第。弟弟温庭皓，咸通年间任徐州从事。节度使崔彦鲁被庞勋所杀，庭皓也遭杀害。庭筠一生著述颇多，他的诗歌辞赋韵格清秀脱俗，读书之士都大为称颂。

### 李商隐

李商隐（813～858）字义山，号玉谿生。唐怀州河内（今河南沁阳）人，自幼能文，才智出众，深得牛党令狐楚的赏识，被引为幕府巡官。后举进士。李党泾原节帅王茂元爱其才，辟为掌书记，又以女妻之。后牛党当权，商隐长期遭到排斥。后任剑南东川节度判官、检校工部郎中，一生穷困不得志。在他的诗中反映了对晚唐国运的关心和对宦官专权的愤慨，通过一些咏史诗曲折地表达了他的政治见解。商隐诗以抒情见长，故所作情诗多为人传诵，成就最高者为七言律诗，语言凝炼，典丽精工，在这方面他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、沉郁顿挫的特色，融合了齐梁诗色彩的浓艳，以及李贺诗幻想象征的手法，成为唐代一大家。他的诗歌，尤其是爱情诗，对后世影响很大。有《樊南文集》、《樊南文集补编》。

李商隐自幼就能写文章。令狐楚镇守河阳时，商隐用文章触犯他，年仅二十岁左右。令狐楚因为他年纪轻，才智出众，待之以礼，并让他和自己儿子们交游。以后令狐楚督镇天平军和汴州时，商隐跟从他作为巡官。令狐楚每年供给他费用和衣服，让他跟自己回到国都长安，报告本道当年政情及收入、户口等情况。



李商隐像

开成二年（837）才考中进士，任秘书省校书郎。后迁为弘农县尉。会昌二年（842），又因书判优异，以拔萃选及第。王茂元镇守河阳时，征召他任掌书记，后来又得到侍御史的官职。王茂元爱惜他的才干，把女儿嫁给了他。茂元虽然读书为儒，但原本是将门之子，李德裕一向信任他。当时德裕掌权，便起用茂元任河阳镇帅。德裕和李宗闵、杨嗣复、令狐楚之间结怨很深，商隐既然作为茂元

的从事官，李宗闵之流便非常轻视他。当时令狐楚已经去世，其子令狐绹任员外郎，令狐绹因为商隐辜负父亲的恩德，特别憎恨他的品行。不久，王茂元去世，商隐出游到了京师，许久得不到转迁。正遇上给事中郑亚视察桂州，邀商隐任观察判官、检校水部员外郎。大中（847～860）初年，白敏中执掌朝政，令狐绹在内府，一同把李德裕排挤出朝廷。郑亚因为和德裕同党而获

罪，也遭贬谪，任循州刺史。李商隐跟随郑亚在岭外多年。大中三年（849）商隐入朝，京兆尹卢弘正奏请任命商隐为佐官，让他主管表奏。第二年，令狐洵作了宰相，商隐多次上奏陈述衷情，令狐洵都不能明白。卢弘正镇守徐州，商隐又随从去作掌书记。府职结束后被征入朝廷，又用文章求取令狐洵的谅解，于是补任太学博士。正巧河南尹柳仲郢镇守东蜀，便辟召他任节度判官、检校工部郎中。大中末年，仲郢因专擅杀人而获罪贬官，商隐也被罢免官职，返回郑州，不久病死。

商隐能作古文，不喜欢对偶。在令狐楚幕府供职时，楚善于撰写上陈皇帝的章奏，便把写作方法教给了商隐，从此戒为今体章奏。商隐学问广博，强于记忆，落笔后不能自己，尤其善于撰写悼亡祭奠之文。他和太原温庭筠、南郡段成式齐名，当时号称“三十六体”。论文章思路 and 文辞清新华美，温庭筠胜过他。但二人都没有保持节操，依靠自己的文才，思想奇异偏激，背离常理，被当权者所轻视。功名、官职都无所成就，终生穷困不得志。他的弟弟李羲叟，也通过进士科及第，屡任宾佐。商隐有表状集四十卷。

## 四、宋元文学名家

### 欧阳修

欧阳修（1007～1072），字永叔，号醉翁，晚年又号六一居士。宋代吉州庐陵（今江西吉安）人。幼年家贫好学，以至用荻草杆画地练字。后得韩愈稿，立志学古文，以期达到韩愈的成就。天圣八年（1030）中进士。景祐年间任馆阁校勘。因替范仲淹申辩，被贬为夷陵县令。庆历三年（1043）主持谏院。后出任滁、扬、颍等处知州十一年。嘉祐二年（1057）主持进士考试，排抑险怪奇涩的“太学体”，促使文风为之一变。加龙图阁学士，任开封府知府。升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。嘉祐六年（1061）任参知政事。英宗初，主张尊英宗生父濮王为“皇”，遭到非议。他力求退职，出外为亳州、青州、蔡州知州。在青州任上，反对王安石青苗法。熙宁四年（1071）退职，次年去世。他的文学成就异常突出，为文学史上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发动了宋代的古文运动，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。他也是史学家，与宋祁合作修《新唐书》，自撰《五代史记》。还有《集古录》、《欧阳文忠公集》、《六一词》等。

欧阳修四岁时失去父亲。母亲郑氏，誓志守节，亲自教他学习。家贫，无钱买纸笔，甚至用荻草杆当笔，以地为纸，学习写字。他自幼敏悟过人，读书之后就能背诵。到二十岁时，已有较高的名声了。

宋朝建立已将近百年，而文章体裁，还在承袭五代时风气。



欧阳修像

文字过分讲究雕琢对偶，文风萎靡不振，读书人大多因袭着这种陋习，不肯革新，文章立论卑下，气势萎弱。苏舜元、苏舜钦、柳开、穆修这些人，都有意振作文风，但力量不足。欧阳修游历到随州，在废旧书籍里发现了韩愈遗稿，读过之后很是敬慕，遂立志刻苦地学习探索，以至于废寝忘食，决心要赶上韩愈并和他并驾齐驱。

他参加会考，中礼部试第一名，被拔擢为甲科。调

任西京推官。开始与尹洙往来，一起写作古文，议论时事，两人互为师友。他又与梅尧臣往来，互相之间用诗歌唱和，于是他以文章名冠天下。后被召入朝廷，任馆阁校勘。

范仲淹因向朝廷上书言事被贬谪，在朝大臣多数为他申辩救援，唯独司谏高若讷认为应当贬黜。欧阳修写信责备他，说他不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。高若讷将信上报皇帝，因此欧阳修被贬为

夷陵县令、转任乾德县令、武成节度判官。仲淹为陕西都转运使，召请他掌管书牍文件。他笑着辞谢说：“往昔我写信指责高若讷，难道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？当初我们同时退，如今不同时进是合适的”。过了很久，恢复馆阁校勘，升集贤院校理。庆历三年（1043），执掌谏院。

当时，仁宗更换大臣，杜衍、富弼、韩琦、范仲淹这些贤能者都在重要的位置上，要增加谏议官名额，多用天下有名气的读书人。欧阳修是第一名人选。他每次进见，皇帝都提出广泛的政事问题，征询哪些事适宜实行。从此政事多所兴革，小人们常聚、合一起非议。欧阳修担心好人肯定斗不过他们，就几次对皇帝分别陈述。

当初，范仲淹被贬到饶州时，欧阳修和尹洙、余靖都因替仲淹辨冤被赶出京城？人家说他们是“党人”。从此，“朋党”的议论兴起，于是他写《朋党论》上报皇帝。文章的主要内容是：君子以志同道合为“朋”，小人以利益一致为“朋”，这是自然之理。臣以为小人没有朋，只有君子才有朋。为什么呢？小人喜好的是利禄，所贪的是财物，当他们利益相同时，暂时伙同一起为朋，那是假的。到他们见利而争先，或利尽时，反过来互相伤害甚至残杀，纵然是兄弟、亲戚，也不能互相保护。所以说小人无朋。君子则不然，他们所坚持的是道义，所实行的是忠信，所爱惜的是名节，以此修养自身，则因同道而互相补益。以此为国家做事，则因同心同德而互相救助、接济，始终如一。所以说，只有君子才有朋。商纣王有臣子亿万个，心也有亿万条，可算是无朋了，商因此亡国。周武王有臣三千，唯其他一心，可说是“大朋”了，周朝因此而兴旺。所以君子的朋，不厌其多。为君王的应当退小人的假朋，用君子的真朋，则国家定会安定清明。

欧阳修议论事情非常直率，不免得罪人，有些人把他看做仇敌，独有皇帝奖励他敢说话，当面赐给五品服饰。并对待从大臣



说：“像欧阳修这样的直言敢谏，到哪里去找？”于是令他参加修起居注，并委以知制诰的重任。按照先例，这个职务必须经过考试后任命，皇帝了解他的才学品德，指示以特例直接授予。

欧阳修奉命为河东路使者。自西部打仗以来，议论这个问题的都要求放弃麟州以节省军饷。他说：“麟州不可废弃，如丢掉它，则黄河以内的郡县，人民都不能安居乐业了。不如分开兵力，驻守沿黄河以内诸堡垒，紧急时可以互相应援，平时也可以节省辗转运输，这是比较便利的策略。”由此麟州得以存留。又说：“忻州、代州、岢岚有很多朝廷禁地和荒废田土，请令百姓自由耕种它，不然，将会为敌人所有。”朝廷将这意见交有关部门研究，很久以后才得以实行；每年收获粮食几百万斛。凡是河东路地区赋税过重，人民难以忍受的，经他上书得以免除的有十几件。

欧阳修从河东回到京师，适逢保州兵乱，朝廷又命他以龙图阁直学士衔，任河北都转运使。临行前向皇帝辞行，仁宗说：“不要打算长久在那里，有话说时，就说。”欧阳修回答：“臣在谏院任职时可以批评建议。如今再议论就是越职，那是有罪的。”仁宗说：“只管说，不要把在朝在外分得太清。”兵乱平息后，大将李昭亮、通判冯博文私自收纳民间妇女，欧阳修逮捕了博文把他投入监狱，昭亮因此惧怕，立即放出所收留妇女。兵乱刚起时，官方招抚他们说，投降不杀，但后来把他们都杀掉了，还有胁从二千人，是分属于几个郡县的。富弼为宣抚使，恐怕以后再生变乱，准备要求各地同一天杀掉那些胁从者，他与欧阳修在内黄相遇，半夜时，命随从退避后告诉他这个决定，欧阳修说：“祸患没有比杀掉已投降的人再大的，何况是胁从呢！既然不是朝廷的命令，假若一个地方不听从，这个乱子可不小。”富弼明白了其中利害，遂避免了这场杀戮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杜衍等人相继被污蔑为朋党而罢官，欧阳修

很愤慨，上书说：“杜衍、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，全国都知道他们是可用的贤者，没有听说有可以罢官的罪行。自古以来，小人谗害贤者，说法与今日差不多。想要广泛地陷害良善，无过于指为朋党。要想动摇大臣，必须诬蔑其为专权，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何在？除去一个好人，众多好人还在，于小人并不利；想要全部除掉，则善人过失又少，很难为他们一一挑出毛病，唯有说他们是一党，则可以一时全部除去。至于如自古以来的大臣，已被主上了解并得到信任，则难于用其他事情动摇他，唯有‘专权’是主上所最憎恶的事，必须这么说，才可以推倒他。正直的人在朝，为邪恶的小人所忌恨。自己的谋臣不用，那是敌国的福气，如今这四人一旦都罢官，使一帮邪恶小人互相庆贺于朝内，四方夷狄互相称贺于边外，臣为朝廷可惜。”从此邪党更加忌恨他，借他张姓外甥的罪附会到欧阳修身上，为此被降为知制诰、实任滁州知州。过了二年，转任扬州、颍州。又恢复学士官衔。在留守南京时，因母亲去世回乡服丧。期满，被召回京师就任流内铨事，这时已在外地历经十一年了，皇帝见他头发已白，问候慰劳很周到。小人怕他再被重用，有人假造他的奏疏，说他要求朝廷清洗内侍中为奸利的人。那帮内侍都对他既恨且怒，在皇帝面前诬陷他，打算赶他到外地任同州知州。皇帝因接受吴充的意见而停止。朝廷升欧阳修为翰林学士，以便命他修《唐书》。一次，欧阳修出使契丹，契丹国主命令尊贵大臣四人执掌宴会，说：“这不是常例，是因为你的名气大。”

嘉祐二年（1057），欧阳修主持进士考选，当时读书人还在写险怪奇涩的文章，号称“太学体”。他痛加排除压抑，凡是写这样文章的往往被黜落。考选事毕，以前那些爱吵吵闹闹的轻薄之徒等他出门时，就围聚在马头前吵闹，街上巡逻者都不能制止。可是科举考试文章的风气，从此有所转变。

朝廷加欧阳修龙图阁学士衔，任开封府知府。他在任上，承

接包拯的威严作风之后，尽量减少繁琐，遵循理法，不求赫赫名声，京师也很安定。任职刚十个月，又改任群牧使。《唐书》修成，升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。他在翰林院八年，知无不言。黄河在商胡决口，北京留守贾昌朝要开横垆故道，使黄河回头东流。有个叫李仲昌的，要导入六塔河，参加议论的人无所适从。欧阳修上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，他说：“河水混浊得厉害，没有不淤的道理，下游淤塞，上游必然决口。从近期经验看，挖掘河口固然能解除淤塞，故道也不是不能恢复，但这些措施都不能持久。横垆功大难成，即使完成也将重新决口。六塔河河道狭小，而以全部黄河水注入其中，必然使滨、棣、德、博等地受害。不如因着水势流向，增高堤防，疏浚下游，以便使其入海，这样可收数十年的利益”。但是宰相陈执中力主按贾昌朝的意见治理，文彦博则赞成李仲昌的主张，因此议而不决，到底还是导致了河北的祸患。

谏议官员上书批评宰相陈执中错误，而执中还不及早求退，企图保留官位。欧阳修上书说：“陛下拒绝忠言，庇护愚昧的宰相，这将损害陛下圣德。”不久，执中被罢官。狄青为枢密使，掌握军权，有威武的名声，皇帝有病，谣言四起，狄青处境险恶，欧阳修请求罢除狄青兵权，派他到外地任职，以保他善终，遂罢狄青枢密使，出外任陈州知州。欧阳修曾因水灾上书说：“陛下君临天下已有三十多年，还没立太子。往昔汉文帝初即位，因群臣建议，及时立下太子，而在位长久，为西汉太宗。唐明宗厌恶别人说立太子事，不肯早定，以至引起秦王之乱，国家被颠覆。历史的经验很清楚，陛下还有什么疑虑而长久不定呢？”其后立英宗为太子，原因就在于此。

嘉祐五年（1060），欧阳修任枢密副使，六年任参知政事。他在军事机关枢密院，与曾公亮考查全国兵数和三路屯戍兵的数量、地理远近，制成图籍。凡是边防长期缺少戍兵的，一定加以

寻找补充。在政府，与韩琦同心辅佐皇帝治理国家。凡是兵民、官吏、财利中主要情况，中书省应当知道的，他就搜集整理，制成总目录，遇事不再到有关部门询问。当时太子还没定，与韩琦等商定对这件大事的建议。此事记述在《韩琦传》里。英宗因病没有亲自处理政事，皇太后垂帘听政，左右侍从们交相构陷，几乎造成皇太后与英宗之间的嫌隙。韩琦报告政事时，太后哭着述说原因，韩琦以皇帝有病解释，太后心里疙瘩还没解开。欧阳修进言说：“太后侍奉仁宗数十年，您的仁德为天下所称道。往时温成受宠之事，太后处理得很从容；如今是母子之间的事，反而不能容忍吗？”太后心意稍有缓和，他又说：“仁宗在位很久，所施恩泽深入人心。所以一旦去世，天下拥戴嗣皇帝，无一人敢于非议。现今太后不过一位妇人，我等不过五、六名书生，要不是仁宗留下的旨意，天下谁肯听从！”太后没话可说，时间久了这事也就作罢。

欧阳修平生与人总是把话说透，无所隐瞒。到执掌政权时，人们有所请求，总是当面说清可或不可，就是与谏议官谈事，也必定问清何者是，何者非，从不模棱两可，因此怨恨他诽谤他的人越来越多。欧阳修也极力请求罢退，遂被罢为观文殿学士、刑部尚书、出任亳州知州。第二年，升兵部尚书、改任青州知州。又改宣徽南院使、兼任太原府知府。他推辞不就，转往蔡州。

欧阳修以高风亮节立身处世，既然几次被污蔑，且年已六十，当即连连请求辞官，皇帝常常是温言相劝，不许辞职。在青州任职时，又因请求停止散发青苗钱，被王安石诋毁，因此请求归乡的心意更切。熙宁四年（1071），以太子少师退職回乡。五年去世。朝廷赠他太子太师衔，赐谥号“文忠”。

欧阳修开始在滁州，自号“醉翁”，晚年改号“六一居士”。天资刚劲，见义勇为，虽知陷阱在前，也勇往直前而不顾。几次被放遂流离，志气并未消磨。当他被贬到夷陵时，因无所消遣，

遂取出旧的案卷反复观看，见其中的冤枉差错多得数不清，于是仰天长叹说：“以这样荒僻小城，尚且如此，天下的事由此可知。”从此，遇事不敢忽略。读书人求见，和他们谈话，未曾涉及文章，只谈政事。他认为文章只能有益于自身，政事可以有益于老百姓。他先后任职几个地区，虽看不出显著政迹，也不求声誉，作事务求宽简以不扰民为准，因此所到之处人民都得到便利。有人问他：“您做事既宽且简，而事情也不松弛不废置，是什么原因？”他说：“以放纵为宽，以粗略为简，那政事必然弛废，老百姓受害。我所谓‘宽’是不作苛刻峻急的事；所谓‘简’，是不作繁琐的事。”他自幼失去父亲，母亲曾对他说：“你父亲做官，常常在灯下整理案卷文书，屡次停下叹息。我问他，他说：‘这是死刑犯的文书，我要寻找可以不杀的根据，找不到啊！’我说：‘既已判死刑，怎能再找到不杀的根据呢？’他说：‘寻求生的根据而不得，则死者和我都没有遗恨。常常为他们找生路，尚且有冤死的失误，而世间办案却是寻求判死罪的根据。’他平时教育其他子弟，常说这番话，我听熟了。”欧阳修听到后终身恪守这个原则。

欧阳修写文章率性自然，详略得当。语言简要而明白，准确而通达，广泛征引事物以说理，努力使人心服。他的文学成就远远超越众人，所以全国的读书人都以他为中心，尊他为师。他奖励引导后进者，唯恐做的不多，只要他赏识的，一般都成了有名气的人。曾巩、王安石、苏洵及其儿子苏轼、苏辙，都曾经是平民，住处好象隐藏着，没人知道他们。欧阳修就到处称赞，以扩大他们的声誉，说他们日后必定显名于世。他对于朋友情深意厚，朋友活着时尽力扶持举拔，死后则照顾他们的家属。

欧阳修还特别喜欢研习古代文化，凡是周朝、汉朝以来刻在铜器、石头上的文字，以及断残的书简，全都收集起来，研究考察他们的异同，在旁边写上自己的见解，非常清楚准确，名为

《集古录》。他又曾奉皇帝诏命纂修《唐书》中的记、志、表，自己撰写《五代史记》，章法严谨，用词简约，多采取《春秋》的文意。苏轼为他的文章作序时说：“论述基本道理像韩愈，议论事件像陆贽，记叙事物像司马迁，所作诗赋像李白。”见识高明的人都认为这是最了解欧阳修的话。

## 苏 轼

苏轼（1037～1101）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。宋代眉州眉山（今四川眉山县）人。嘉祐二年（1057）中进士。调福昌主簿，授凤翔府签书判官。治平二年（1065）入京师，任登闻鼓院判官，经过考试，得以直史馆。熙宁（1068～1077）年间上书，指出王安石新法不合实际，因此，被赶出京师，任杭州府通判，又先后调任密、徐、湖三州知州。元丰二年（1079），因作诗讽刺新法，下御史台狱。出狱后，以黄州团练副史安置。哲宗时任翰林学士。元祐二年（1087）兼侍读。四年（1089），又出任杭州知府。六年（1091），召还为翰林承旨，不久又出任颍州、扬州知州。七年（1092）召还，官至礼部尚书兼端明殿、翰林侍读两学士。哲宗亲自执掌政权，又派他出京任定州知州。绍圣初年，御史劾奏他掌管皇帝诏令时所作文词“讥斥先朝”，被贬谪到惠州、琼州。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）在常州病逝。

他学识渊博，文章广大深沉，纵横恣肆，为我国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他还擅长诗词。又是著名的书画家。他著述很多，诗文有《东坡七集》、《东坡乐府》等。

苏轼十岁时，父亲苏洵到外地游学。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，听到古今人物成败得失，他能说出其中要点。程氏读东汉《范滂传》，因感慨而叹息，苏轼问：“我若是做范滂那样的人，母亲准许还是不准许？”程氏回答：“你能如范滂，我难道不能为范滂的母亲吗？”



苏轼像

到二十岁，博通经史，撰写文章一日可得数千字，喜爱贾谊、陆贽的奏议。又阅读《庄子》，赞叹道：“我先前有所思想，嘴说不出来，今天读到此书，正与我的心思符合。”嘉祐二年（1057）到京应礼部考试。正值当时文章为追求奇特而不惜割裂文义的弊病盛行，主持考试的欧阳修早想纠正这种弊病，现在得到苏轼的《刑赏忠厚论》，又惊又

喜，要拔擢为第一名，因试卷糊名，还怀疑是自家客人曾巩所作，为避嫌疑，只好放在第二名；苏轼又以《春秋》答题得第一，殿试中乙科。后来，欧阳修见到他的书信，对梅圣俞说：“此人文采将比我高出一头。”听到这话的人开始反应强烈，都不满意，日子久了才信服。

苏轼为母亲去世守孝。嘉祐五年（1060），调任福昌县主簿。欧阳修因他才识兼优，推荐到皇家图书馆。考试“六论”，先前人们都不起草，因此文章大多不够精细，苏轼开始起草，文

义十分精彩。又对制策，入三等。自宋朝初年以来，制策入三等的，只有吴育与苏轼两个人而已。

苏轼升大理评事，以京官身份出任凤翔府判官。关中地区自元昊叛变后，百姓十分贫穷，而且劳役很重。陕西岐山一带每年输送南山木排，自渭水入黄河，中间经过砥柱险区，损失极大，需要赔偿，使得负责此事的衙吏相继破产。苏轼调查这事的利害所在，修改衙规，让他们自己选择水工，根据时间宜进则进，宜止则止，从此损失减少一半。治平二年（1065），调入京师主持登闻鼓院。英宗在藩府时就听说苏轼大名，打算以唐代事例召入翰林院，任知制诰。负责起草皇帝诏令等文书。宰相韩琦说：“苏轼的才能，可能成为国家栋梁，日后自当为国家所用。关键在于朝廷注重培养他，使天下官员心悦诚服，都希望朝廷用他，然后再任以要职，那时人人没有别的话说。今天骤然放置重要地位，人们未必认为任用得当，这样，恰恰对他不利。”英宗说：“暂且让他修起居注如何？”韩琦说：“记注与制诰事极相近，也不可骤然交给他。不如于馆阁中接近皇上地方给他以兼职事务。还请让他经过考试。”英宗说：“考试不知能否通过，如苏轼不能通过怎么办？”韩琦仍坚持考试，及至考试“二论”，又列为三等，这才得以入史馆任职。苏轼听到韩琦的话，说：“韩公可算是爱人以德了。”

熙宁二年（1069），为父丧守孝期满，还朝。正值王安石当政，安石平素厌恶他与自己政见不同，就命苏轼到官告院任职。四年（1071），安石要改变科举考试内容，兴办学校，皇帝命两制、三馆人员议论。苏轼上书反对。……神宗看了他的意见，顿然明白，说：“我原来对此就有怀疑，得轼议论，心意坦然了。”即日召见苏轼，问道：“当前政令得失在哪里？纵然是我的过失，也可直接指出。”苏轼回答：“陛下生而知之，天赋予文武兼备才能，不怕不明察，不怕不勤劳，也不怕不能独断，只怕求



治太急，听取意见太广泛驳杂，进升人才太急速。愿能以静制动，待事故、问题出现，然后相机处理。”神宗当即有所警惕：“卿的三句话，朕当仔细考虑。凡在馆阁任职的，都应当为朕深入思考如何致治防乱，不要有所隐瞒。”他出来把这番谈话告诉同事。安石不高兴，遂命他暂任开封府推官，企图让他事务缠身，无暇再考虑国家大事。苏轼断决公务又精确又敏捷，声名更加远播。适逢元宵节，皇帝令开封府购置浙江所产彩灯，而且令压低价格。苏轼上书说：“岂是陛下喜爱看灯？这不过是讨两位太后的欢心罢了。可是百姓不会都明白。必定说是为满足陛下的耳目欢娱，夺去他们衣食必须的钱物。此事虽小，关系甚大。愿能够追还命令。”神宗即令停罢此事。

这时，王安石创行新法，苏轼上书论述它的不便。

他又见王安石赞美神宗独断专任，因借考试进士出对策题机会，问：“晋武帝平定吴国因独断而成功，苻坚讨伐晋国因独断而亡国，齐桓公因专任管仲而为五霸盟主，燕唵因专任子之而失败，事情相同而功效各异。”对此，王安石暗中非常恼怒，唆使御史谢景温论述苏轼的过失上报，可是终于没有找到能定罪的事实。苏轼知道后，就请求到外地任职，得为杭州府通判。

当时实行新政的命令几乎每日下达，苏轼在执行新法过程中，以便民为准，百姓赖以安宁。又调到密州任知州。在任期间，司农实行“手实法”，并规定不按时实行的以违制论处。他对提举官说：“处以违制之罪，若是命令来自朝廷，谁敢不从？出于司农，这是擅造律令啊！”提举官很吃惊，说：“您暂且缓办。”不久，朝廷知道此法害民，罢除了它。

调任徐州知州。黄河在曹村决口，泛滥到梁山泊，溢漫到南清河，汇集于徐州城下，如果水只能上涨而不能及时下泄，城墙将会倒塌。当地有钱人争相出城避水患。苏轼说：“有钱人一走，百姓都会动摇，我还和谁守城！我在这里，决不能任水败坏